

清末设在长葛的许长公立中等蚕桑实业学堂

时 文

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堂。许州在光绪 30 年（1904）之后，才办起了一批学堂。在这批学堂中，许长公立中等蚕桑实业学堂，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在长葛县城散发出诱人的光芒。

许长公立中等蚕桑实业学堂，创办于光绪 33 年（公元 1907）。当时，清政府规定，县级只能办初等实业学堂，州、府才能办中等实业学堂。许州知州润芳、长葛知县潘守廉 2 人倡立许长公立中等蚕桑实业学堂，意为州、县合办。校址选在长葛县城（今老城）南门内，州、县倡捐，官民绅商集资壹万叁仟余金。建修讲堂 15 间，自习室 15 间，管理员、教员室 12 间，接待室 3 间，学生接待室 2 间，理化室 3 间，阅报室 3 间，储藏室 3 间，学生寝室 42 间，司事室 2 间。夫役室 2 间，厨房另院 10 间，体操场一处，试验场一处。

又立蚕桑会社，集股创办于陈尧村，买地 50 余亩，植桑万余株；邑绅王铭阁向学堂捐东关桑园一区，计地 5 亩，植桑 500 余株。这两处桑园统归学堂养蚕之用。

学堂设监督（校长）、监学（教导主任）、庶务（总务）、书记（秘书）各一人。全校每年额支 2500 余缗（按：一缗即十串铜钱，一般每串一千文），活支 700 余缗。

许长公立中等蚕桑实业学堂按清政府规定，招收年龄在 15 岁以上的高等小学堂毕业生。学科分普通、实习两种，遵照定章组织教学，加强实习，指导学生植桑养蚕。每年收茧制丝 500 多斤。

光绪 34 年（1908），省护抚院派提学司会同商务工农局、司、道前往许长公立中等蚕桑实业学堂进行查核。经过查核，认为许长公立中等蚕桑实业学堂是按照中等实业学堂定章办学，对办学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亲写奏折，奏报皇上立案。奏折原文是：

前护抚院朱奏长葛县公立中等蚕桑实业学堂折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一日
奏为长葛县公立中等蚕桑实业学堂，谨遵章奏明立案，恭折，仰祈圣鉴事。窃维阜民以实业为先，实业以蚕桑为亟。豫省蚕桑之利，尚未开通，历

经飭属等设学堂，讲究栽桑饲蚕之法，以浚利源而裕民生。兹据前代理长葛县知县潘守廉详“该县合同绅董，捐集款项，按照中等实业学堂定章，于城内建设许长公立中等蚕桑实业学堂，业经选聘教员，招集生徒，于本年二月开学。学科分普通、实习，三年毕业。其非由高等小学毕业考入者，先习预科二年，再升本科。此外，另设别科，年半毕业，以广造就。全校学额暂定二百八十名，俟续筹得款再行扩充。常年经费除酌收生徒学费外，随时筹款补助，以期经久”等情，详经前抚臣飭由提学使司会同商务农工局、司、道，查核该县拟订章程，并派员前往勘验工程及图书器具，均属合法。详请奏启立案，前来臣复加查核。振兴实业，本系当今切要之图，然非设学研求，无以阐精理而广进步。今该县督绅筹设中等蚕桑学堂，开办已逾半年，规模大致毕具。从此切实办理，洵于实业前途良多裨益。应请飭部立案，以垂久远。俟将来毕业届期，所有奖励等项，应援照定章，分别拟办。除将该学堂章程分咨查照外，理合恭折具陈。伏乞

皇太后

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奉。

朱批：该部施欵此

许长公立中等蚕桑实业学堂。在当时河南全省实业教育界享有盛誉，以“规模宏大，学科完全，为豫省实业学校之冠”著称。

民国初，教育部令改实业学堂为实业学校。1914年（民国3年）河南省教育司令改中级实业学校为甲种实业学校。许长公立中等蚕桑实业学堂改为长葛甲种蚕桑学校。

民国2年，河南省教育司长李时灿，曾为创办许长公立中等蚕桑实业学堂的捐资兴学的人员请奖，结果有3人获得教育部颁发的金质3等褒章。请奖原文是：

河南民政长张 八月二十三日

为咨请查核给与褒章事。教育司长李时灿案呈。

据巩县知事嵇炳元呈称：为呈请事，中华民国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政府公报第四百四一号，登载教育部令第三十二号，教育部制定《捐资兴学褒奖条例》，经由国务会议议决，兹公布之。此令附则第九条，捐资在本条例公布前三年内者，亦适用之。等因，窃查知事与前清光绪三十四年正月间，在长葛县创设许长中等农业学校蚕桑科一所，规模宏大，学科完全，为豫省

实业学校之冠。筹经费无出，办理殊费经营。每岁出入各款除酌收学费外，一切不敷之款，统由知事设法筹垫，并借资移注。计自前清光绪三十四年起，至宣统二年止，年复一年，债台层级而上，适至宣统二年下学期，实有一日不可支之势，除由知事设法捐垫外，当承邑绅王铭阁等，目观学款维艰，兴起急公热情，慨捐巨资得以履行债务，而该校学生亦得因此完全毕业，不致中途废弃。当时王铭阁等，意在提倡教育，不愿邀请褒奖，言词坚切，故未呈请给奖。兹蒙文部颁布旷典，在知事固未敢仰邀奖励，而王铭阁等热心教育，捐助巨款，虽属意不在奖励，究未使没其急公好义之忧，至王铭阁等捐款数目，及出入款数目，均须造具一览表，财政月报呈送前提学司，各在案。所有知事前在长葛办理学务，经邑绅王铭阁等捐款协助情形，核与部颁旷典适相符合，仰恳鉴核，俯赐飭查，照章分别给奖，不胜感激。

据此，查该执事前在长葛县创办学校，担任款项二千两外，并由王绅铭阁，李生克智各捐资一千两，均经前提学司孔祥霖，飭长葛知事潘守廉查明属实，出具切结各在案。现据该知事呈请，遵照贵部制定《捐资兴学褒奖条例》第九条核办。前来理合查照条例第五条办法，将该执事等年岁、籍贯及捐款额数目，一并造册，咨请贵部查核办理，实为公使便。此咨教育部。

附呈请册一本。

河南民政长，谨将前许长中等蚕桑实业学校捐资各员姓名、年岁并捐助经费数目，开具清册，送请鉴核。

计开嵇炳元，年三十八岁。浙江德清县人，前任该校监学。捐银二十两。请奖金质三等褒章，曾祖文明，祖树棠，父三杰；王钦，年十九岁，河南长葛县人，系前任该校监督王铭阁之子，捐银一千两。请奖金质三等褒章，曾祖希曾、祖鸿恩、父铭阁；李克智，年三十岁，河南长葛人，系河南政法学校毕业，捐银一千两，请奖金质三等褒章，曾祖炳南，祖国恩，父士楷。

民国16年（1927），省令实业学校一律改为职业学校。长葛甲种蚕桑学校改为长葛县立职业学校。民国17年，省令长葛县立职业学校改为长葛县立初级中学。这所规模宏大的实业学堂实际存在21年。

漫忆我所知道的私塾学校

辛根法

相传孔子在杏坛收弟子办学，公开提出“有教无类”原则，开私人办学的先河，这就是中国私塾的开端。这种办学形式从春秋时代到民国初年，延续了二千五百多年，形成一整套办学模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笔者小时候念过十年私塾，仅就所知，回顾如下。

私塾的分类和塾师的聘请

私塾从县城到乡村，大体分为三种。

一是启蒙私塾房。这种塾房收5—15岁的小学生，几乎村村都有，小村一个，大村3—5个不等，老师多在本村念过四书、五经的读书人中选聘，每个老师收15—20个学生，老师回自己家吃饭，每年每个学生束金（银圆）2—3圆。象我们家乡董村千口人以上的大村，每年办这样的私塾就有4—5处，收学生80—100人。在学生家长中选出能办事热爱教育的人为东家，负责聘请老师、组织学生、收束金、处理学生中日常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二是开讲私塾房，这也可以说是中等私塾房，多数是从外地、外村聘请有功名（秀才、举人）有才学的老师，收15—20岁的学生，每个老师教10—15个学生，这类私塾房只是大村和富户多的村才有，或几个村联办一个。聘请塾师、组织学生需于头年十月左右进行。这时学东很慎重地给老师下聘启，内容是：“敦请大教铎翁某夫子××岁（甲子或己卯）训蒙一载，谨具。束金××圆，奉申聘请，门生×××拜”。到当年正月初由东家再持大贴去请老师到校，贴写“谨占于×月×日敬扫书斋奉迓。文驾、仰重、入园、伏冀、贲临、曷胜、欣感。右启。大教铎翁某老夫子大人台下。侍教弟××（东家名）顿首拜”。笔者在董村曾请过吴岗村秀才赵升山老师授教三年，又请大赵庄村县首符致中老师念书三年（县首是全县考取童生的第一名）。每个学生束金7—8圆，老师轮流在学生家吃饭，每顿两个或四个菜，每轮5—10天，并改善伙食一次。象这样的私塾就收有董村周围柳庄、

全庄、殿后刘等村二十岁左右的学生，住在塾房，吃饭自己做。每个塾房都备有煤火，给老师学生温开水洗脸，各种费用按学生人头均摊。

三是大学馆，在县城或者州府才有，由有学位、有名望老师出面组成，象长葛老城南关张副榜家（副榜是科举考试中的一种附加榜示，亦称备榜。即于录取正卷之外，明代设副榜，清代有副贡）。张勋、张定勋（副贡）兄弟办的学馆，收的都是县考、州考落第的大学生，年龄都在二十岁以上。讲四书五经，并谈诗论文，等待科考。这种学馆束金较高，一般农村孩子上不起。另外一种叫义塾的学校，也有两种情况：（1）个人义塾。笔者大祖父辛大降，十年寒窗，满腹经纶，科考不得志，有土地二百多亩，人口不多，家境殷实，于是在自己家开设学馆，穷人家子弟入学不收束金。（2）慈善部门办的义塾，像长葛老城主善局东院设的义塾。义塾不收束金，每年五月初五、八月十五，学生集体给老师送过节礼品，以表敬意。

私塾的学规及教学方法

私塾房尊师重道，学生入学的第一天就得先拜圣拜师。私塾房设圣人牌位：“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老夫子之神位”，再设祭品、香纸、蜡烛、鞭炮等，由老师、东家、家长代表和学生一起焚香鸣炮，以四叩礼拜圣，接着学生用三跪九叩大礼拜师。中午老师、东家会餐一顿，就算私塾正式开学。

学生正式上课后，每天早上背书，双手拿书放到老师桌子上，作揖行礼后，背过身子，背诵头一天读的书文，背后转过身子再作揖行礼后，才能返回座位。学生早饭后来塾房，先得研墨，而后用毛笔写大楷一张，从启蒙的小学生到二十多岁的大学生，天天如此，严肃认真，从不间断。写后交老师审阅，老师逐字逐画一丝不苟，优良者用红笔吃圈，以资鼓励。小学生一开始先照仿影描仿，老师根据学生的年龄程度，以字的简繁写成仿影，诸如：“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佳作人，可知礼”；“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天地分上下、日月明今古”等，描仿几个月后，由简到繁再写古诗，诸如：“春眠不觉晓……锄禾日当午……”等，描仿用的是绵纸。十二三岁以后改用张连纸，临帖写五公分以上的大字，根据学生的天才，分别临写颜、柳、欧、赵等字体。因为塾房十分重视写字，所以对笔、墨、纸、砚四种书写工具，也很讲究，通称“文房四宝。”上午写完大楷而后读书，那时也讲口诵心维，就是读着想。开讲学生由老师讲书，提讲提问。午饭后仍是读书讲书。大学生每五天或十天由老师出题写一篇文章，老

师逐字逐句品评修改。

私塾的规矩是很严的，学校制作两个木板，一个叫手板，约五十公分长，三公分厚、五公分宽，上写“朴作教刑”四个字，凡背书讲书提问不会者，或触犯学规者，就要用板子打手。另一个木板叫“出恭签”，签上写“半日三出，不许并行”放在房里门口，出门时拿出放到房外门口，大小便后回来将签拿回，门口有签学生才能出去，无签必须等候。私塾用房大多数是借用民间闲房，租房的极少。老师、学生每年六个假期：即麦假，寒假，节气假——五月节（端午节）、八月节（八月十五）、清明节、十月初一。每个节气放假两天，收麦放假十天左右。五月节、八月节学生集体给老师送礼品；五月节送一块大肉，还有手巾、扇子、草帽等，八月节送一块大肉，以及月饼、柿子、梨等。由学生集体送到老师家中。年终腊月二十三前放学（即放寒假）。在放学那一天，东家备酒菜会餐一顿，全部付清束金，备牲口拉大车，装上老师的行李、书籍，然后请老师也坐车上，将他送回家。家住本村的蒙学老师就不送了。学生一年所写的字纸，放在字纸池里边，不准乱扔，更不准作手纸用；放学前一天焚烧字纸，烧后的纸灰也要用纸包好撒到双洎河里，顺水东流，以表示对圣人的尊重。

私塾学习内容

私塾的学习内容，大体也分为四个阶段：启蒙、读背四书、开讲、读作文章。

“启蒙”，意思是启发蒙醒。启蒙读物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治家格言》、《幼学琼林》、《鉴略妥注》、《弟子规》、《千家诗》、《杂字本》等十余种。这些小书，经过千百年来筛选，都有很高的阅读价值。《三字经》有一种版本是南宋名儒王应麟先生所著，内容丰富，简练易懂，好读好记，概括性强。《千字文》是南朝梁散骑侍郎周兴嗣编写于梁武帝大同年间，距今有一千四百多年。据传梁武帝教诸王书千字不重复，每字片纸，杂乱无序。武帝召周兴嗣曰：“卿有才思，为我纂之”。兴嗣一夕编纂晋上，鬓发皆白。编成的千字文，对仗工整，条理贯穿，文采斐然，令人称绝。武帝见后，连声称赞，赏赐甚厚。《治家格言》也叫《朱子家训》，作者朱用纯，自号柏庐，明万历年间江苏省昆山县人，一生未仕，研究程朱理学。其著作有《大学》、《中庸》讲义、《删补易经蒙引》、《朱子家训》等，以五百另六个字的家训最有影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朱子家训》

以修身齐家为宗旨，集儒家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含义博大精深，海外将此书作为宝典印刷传诵。《幼学琼林》为明程登吉编著，是古代蒙学中影响最大最好的读物，称为古代的百科全书，内容广博，包罗万象，有天文、地理、历史、人物、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朝廷文武、文事科第、鸟兽花木、驿道鬼神等共分为三十三类，当时有“读了诗经会说话，读了琼林走天下”的说法。

四书包括《论语》（上下两集）、《中庸》、《大学》、《孟子》（上下两集），也称孔、曾、思、孟四书。启蒙书念后，就读《四书》。先读《论语》，论是议论，语是答语，是孔子在鲁国与弟子论学、论治、论礼、论乐的书，故亦称鲁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以“仁”为核心，在《论语》中，孔子讲仁、论仁，出现“仁”字共一百另九处，可见仁在孔子学说中的重要地位。《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分为二十篇，二百五十三章，共计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七个字。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中庸》是孔子之孙，孔鲤之子，子思所作，源于孟子圣人之学。讲中庸之道，至公至平至真至正，无过不及之差。《中庸》一书，共三十三章，三千五百六十八字。《大学》，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孔子弟子曾子作《大学》一书，俱述孔子之言，是修身齐家治国安邦平天下之道，分为十章，三纲领，八条目，一千七百五十三个字。开头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八者大学之纲目也。《孟子》在旧版本，分为上下两集，告子一集分为三集。孟子一书七篇，共计三万五千三百三十七字。

四书念完后，就读五经。五经即：《易经》、《诗经》、《书经》、《礼记》、《春秋》。

《易经》是讲阴阳之道的。是古代用来占卜之书。

《诗经》是古代诗歌集，孔子删诗，上取商、下取鲁，共三百一十一篇，秦以后亡去六篇，今存三百零五篇，三万九千二百二十二字。

《书经》载上古唐、虞、夏、商、周之书，故曰尚书。孔子删而述之，凡百篇，其意微奥。五十八篇，二万五千七百字。

《礼记》，礼者体也，言得事之体也。前圣继天立极之道莫大于礼，后圣垂世立教亦莫先于礼。《曲礼篇》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论，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臣学事

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百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于鬼神，非礼不诚不壮；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礼记》皆孔子门徒共撰所闻，后儒述先圣之言以成书。今存《礼记》为小戴礼记，列入《五经》。圣人所作称“经”，贤人所作称“记”，故礼记称“记”而不称“经”也。

《春秋》原系鲁国史记之书名。孔子作《春秋》以寓褒贬，考十二公以前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大法，其文简约，其旨微奥，故有后贤作传以释《春秋》之义。相传春秋有三传：（1）《公羊传》，公羊姓高，鲁国人，生于周末，作《公羊传》一书。（2）《左氏传》，鲁国贤人左丘明作传一书。（3）《谷梁传》，汉儒作传一书。后生常读的是《左传》。

练习作文章是私塾的重要课程，也是一项长时间功夫，因为科第全靠作文章。学生从开讲后就要做文章。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除科考制度。进入民国，广大农村仍读四书五经，上私塾学八股文章。到民国十几年，私塾虽不学八股文，但老师还讲起、承、转、合，写文章的格式。“起”是破题，“承”是继续，“转”是反讲，“合”是结论。另外还读《论说指南》。它是一种新型的短篇文章。

附带谈谈科考制度。从隋朝开始，设立进士科。唐、宋继续实行进士科。到明清两代科考程序更加完备。清朝科举分为四级，最低级的是知县主持的县试和知府主持的府试，考取童生。县试第一名叫“县首”，府试第一名叫“府首”。童生就有资格参加院试。院试是到州府进行考试，每三年一次，录取通称生员（秀才），生员每县有定额录取人数。当时长葛县十二个行政保，录取十二名秀才。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在京城或各省城举行，由皇帝任命主考主持，考期在秋天，故称秋闱，考取者叫举人，举人县府不分定额，第一名叫“解元”，前五名叫五魁。会试，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由礼部主持。考期在乡试次年三月，故称春闱，各省举人都可参加。考中的叫“贡士”，第一名叫“会元”。殿试由皇帝对合格的贡士在朝廷上进行考试。殿试取360名，其中翰林72名，甲3名，成绩分为三等，一二三甲，并给予不同出身。一甲取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二、三甲各取若干名，分别赐进士出身，殿试揭晓时，在太和殿唱名，同时在长安街挂金榜三天。一甲三名在殿试后立即授官。秀才、举人、贡士只是学位，殿试后朝廷授予官职才是官。

（作者辛根法：长葛县农业局农艺师）

天宝中学始末

王庭湖

天宝宫是一所千年古刹，它座落在长葛市石固南寨西南约一里许，宫院占地 40 多亩，有七层大殿，特别是后大殿气势雄伟壮阔，群众称它是九间九檩朝王殿，宫院四周有庙产 700 余亩，是一座很富庶的道教名观。现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20 年，民主革命者李瑞五在天宝宫创立贫民工读学校，吸收石固附近家庭贫寒的青年学子，在那里一面做工，一面读书。后肖老协、肖茂如先生主持这所学校，把贫民工读学校改为贫民耕读学校，一面耕种庙院周围一部分耕地，一面读书。“七·七事变”后，国民党的财政日益紧张，各地方财政也是捉襟见肘，许昌县就把全县的庙产收归为学田，由县上统管，来弥补教育经费不足。天宝宫贫民耕种学校也被迫解散，接着肖洒（肖茂如的长子）的教导团占据了天宝宫，那里成了一个练兵场所。1940 年夏教导团撤走，天宝宫又空出来了。当时许昌县政府决定把许昌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搬进天宝宫，同时还要创办许昌县立天宝中学。师范搬来了，中学招生了（招两个班 84 名学生），新学年即将开始之际，肖洒又将他的实习二团安插到天宝宫内，把教室的桌凳扔了出来，宿舍的被褥也扔了出来，这真是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简易师范被迫转移小宫，天宝中学被挤到石固南寨内。当时石固是驰名的商业大集镇，万商云集，烟厂林立，人口稠密，房屋狭窄，实难安排十几位教职员工和 100 多名男女学生。经多方协商，千方百计租借了三间陈家祠堂和三间民宅当做教室，就这样勉强地鸣锣开戏了。期末，校长武则申感到学校无法维持下去，于是辞职引退。1941 年春，许昌县当局又委派张惠堂任天宝中学校长。张校长到校后又经多方协商最后在石固南寨小学借了两座教室，勉强凑合了一学期。期终张校长又向县上递了辞呈。学校的前途如何，实在是吉凶难卜。后来县上与当地绅士肖茂如通过协商，成立许昌县立天宝中学校董会，请肖茂如出任校董会董事长，这样以来校址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实习团很快搬走了，学校搬回天宝宫。接着肖洒又从开封请来很有名气的陈德出任校长。

学校回到天宝宫后，教室、寝室和活动场所等都得到了解决，1941 年

秋季又招两班新生，学校规模初成，有三级4个班，教职员工二十多人，学生190多人，教学秩序很正常。每天早晨，琅琅读书声回旋在校院上空。1942年秋，又招新生两班，达三级5个班、学生二百多人。生源来自许昌、长葛、禹县、洧川、尉氏五个县，学校办得红红火火、蒸蒸日上。1943年暑期我们班毕业时，虽说只有三十几个人，但升学的成绩还是蛮好。考取省立汲县高中2人，省立汲师4人、五区洛阳联师6人……。这一年仅石固南寨就被录取6名学生，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昙花一现、好景不长。1944年春，日寇渡黄河侵犯中原，学校随着家乡的沦陷而销声匿迹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大地回春，百业待兴，天宝中学在1946年3月开始复苏了。学校光复后，第一任校长姜运卿主持校政约一年半之久，这段时间学校基本安定。1947年秋，董志中接任校长，这个出身于三青团骨干分子的董志中，对学校控制很严，严防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在学校活动。1947年冬，解放许昌的隆隆炮声，把他吓跑了，学校又一次流散。

1948年，许西县成立，到秋天石固一带的局势已稳定下来，许西县人民政府任命程一凡为许西县天宝中学校长，学校暂搬到石固北寨张家大院上课，当时尚有三级一百多名学生。1948年底长葛县人民政府成立，县府决定将天宝中学并入长葛县中，师生整装步入长葛县中，天宝中学就结束了它的历史。

天宝中学从成立到最后并入长葛县中，历经九年之久，这个很不起眼的学校，对发展石固一带的文化教育来说，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培养的许多青年学生都积极投入革命，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自己的光和热。

（作者王庭湖：长葛一高教师）

葛天中学沿革

刘书宾

私立葛天中学是一所初级中学，始建于1939年。当时后河、石固经济比较发达，为了培养人才，二区区长郭奠五牵头、石固资本家牛桂亭出资、后河绅士刘义铭具体负责筹建这所学校。地址在后河村葛仙灵池西邻（即现在的后河中心小学），于1939年春破土动工，历时两年零五个月，1941年夏竣工。葛天中学座南朝北，有二幢二层教学楼，相距10米左右，两楼间有天桥连通，称为工字楼。教学楼后有两排小瓦房是学生宿舍，教学楼前有个操场。校门高大，围墙整齐。

私立葛天中学1941年秋开始招生，到1948年合并于长葛一中。前后历时七年因灾害与战争等原因，学校曾三起三落，始终没有送走一届初中毕业生。

第一次招生是在1941年秋。校长刘百英（据说是老城人，大学生）受办学筹备领导小组的委托，聘请了教务主任郎京五、训育主任张义初（后河人，兼体、音、美课）、英语教师牛某、国语教师赵某和数学教师李某（荥阳人）、武术教师李某等。经过考试招初中一年级学生两班，一百人左右。学生每人每期向学校交五十斤小麦作为学费。就这样，当时只有比较富裕户才上得起。学生来自洧川、老城、溧水寨、石固、西山口等地。

1942年夏秋，四十多天不下雨，蝗虫满天飞。秋庄稼严重减产，第二年春导致灾荒，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民国三十二年灾荒。灾年给人民带来的是食不裹腹，学生由于无麦交学费，大部分要求休学，学校也就无法再办下去了。

1943年秋，继任校长刘百英，重整旗鼓，组织原班人马又开始招生了。据说招生期一再延长，最后两班初中一年级还没招够八十人。1944年4月麦黄稍时，日本鬼子占领了后河，葛天中学被迫又停办了。

1946年秋，郭奠五复任葛天中学校长，又新聘了动植物教师舒圣泉，音乐教师孙冰如……，大张旗鼓地招收了初一新生百十人，学校第三次开学。1947年秋又招了两班初一新生，在校学生发展到200人左右。1947年冬后河解放，1948年葛天中学全校师生并入了长葛初中。此后，这所学校变为后河（完小）中心小学至今。

（作者刘书宾：后河镇人，曾任长葛一小教导主任）

胡德甫创办坡胡村中心小学

王铁柱 胡其增

胡德甫原名胡百乾，系坡胡镇坡东村人，在旧社会他家是坡胡的大户，他本人是中共地下党员，对教育事业很热心，在1940年就开始筹建坡胡中心小学。

1940年以前，坡胡村只有一所有四个班的学校，还是借用胡德甫家的四合院五间楼房办的。周围十里八村没有完小，比较大的学生（五六年级）上学要跑到十余里外的后河镇或石固镇，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上不起学就辍学在家。胡德甫当时在二区区长杨景贤部下任区队副。他看到学生求学心切，就想办法要创建一所中心小学，由于他在三里五村威望较高，就约保长、甲长、绅士等人商议，以胡家祠堂为基础再筹资进行扩建。胡家祠堂原在坡胡寨东门外，座北向南，占地十余亩，有大殿、拜殿六间房屋，还有门房三间。往前扩可建运动广场，往后扩可建文化娱乐场，往左右扩可建教室，地方绰绰有余，条件非常适合。

胡德甫带头捐大洋120元，在他的影响下，绅士、保甲长纷纷捐大洋，当时的小学校长胡纯一任会计，他也捐款30元，共捐款460元大洋，作为建校经费。在领工头胡书庆的监督下，村民积极行动起来，拆庙宇、刨树木、运砖、运瓦，起早贪黑地干。后来砖不够，又扒了坡胡寨五道门的拱门，就这样，不到一年时间就盖好了6栋18间明亮的教室。

1941年春正式开学，学生达到300多名，原来各村私塾的学生都转到了中心小学，学生覆盖到周围十里八村，禹县边缘村庄的学生也到该校就读。学生不仅有明亮的教室，高年级的学生还可寄宿学校，给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开学的当年，聘请的是中牟县游子力任校长。他思想比较进步，不仅治学严谨，还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唱抗日战歌，书写抗日标语，画抗日漫画，演抗战戏，大大激发了学生、民众的抗日热情，同时也为解放战争培养了一批先进分子。后来，这些学生有很多都积极投身到解放战争的革命洪流中去，也有不少参加了教育工作。

胡德甫任学校校董，校务处挂有他的画像，他很关心学校的管理和建

设，经常到校检查指导工作，他看到学生越来越多，就计划动工再建九间教室，青石根基已打好，可惜由于忙于革命工作停下来了。

1946年秋，由于叛徒出卖，胡德甫被捕，虽经多方营救还是被国民党政府杀害，时年47岁。师生、民众深为沉痛，校长胡友三冒着生命危险带领师生佩白孝到墓地为他致哀。

解放后，党和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当地人民群众和师生永远怀念他。

石固高中的始末

李景周 王庭湖

石固高中建校于1969年季，坐落在石固公社乔庄大队（今乔庄村）前街路北一个院内（今乔庄小学），路南还有十余亩地，作为农业试验田，学生200多名，由各大队贫下中农推荐，学制三年半（后改为二年）。

学校全面工作由张隆和（共产党员，从许昌县八中回来）负责，人员按军事连排编制，张隆和任连长。贫下中农代表乔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乔振合担任连指导员。下分四个排，各排都有辅导老师，一排郑东英，二排宋丙芹（70年春王庭湖接任），三排李景周，四排杨明舟。各排设排长一人，每排下分若干班，各班设班长，均由学生担任。教师有从长葛一高回来教学的赵献琮，从濮阳×学校回来教学的雷国海，从鄢陵一中回来教俄语的杨明舟，从许昌三中回来教地理的王庭湖，从长葛二中回来教语文的李景周，从郑县×学校回来教化学的郑东英，从商水×学校回来教语文的陈瑞松，还有本公社的周家长、张振邦、王天章等。这些教师平均年龄在四十岁上下，多数具有大专学历，而且都是教学多年，富有经验的教学骨干。后来又到校的有张玉珍（女），教农业，后改教物理，以及教语文的杨明琛等。

学校组建革委会，张隆和任副主任，正主任由公社干部担任，杨明舟、郑东英任委员，负责全校的工作。

学校实行全日制，抽课余时间搞政治活动，或轮流到工厂和试验田劳动。

由于推荐的学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多数具有初中一、二年级水平，有的只有小学程度，还有的是初小校长、转业军人，另外还有的参加过“四清”，只有实践经验。因此，知识课先从初中内容讲起。

当时开设的有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课。没有课本，政治课选讲报纸、杂志上的文章，如《人民日报》社论等。语文课选讲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的文章，如“老三篇”、《论人民民主专政》及有关文章如《小车不倒只管推》等。物理讲“三机一泵”（三机：柴油机、电动机、拖拉机，一泵：水泵）构造的原理、使用方法与维修等，由于某些原因，没开外语和历史课。

政治活动主要是传达中央文件，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宣讲大批判文章，写大字报，开展革命大批判，或请公社干部到校作时事报告，请贫下中农代表到校讲村史、家史，还到许昌水道杨村参观杨水才事迹展览等。有时是参加各大队的政治活动，如参加合寨李大队的“忆苦思甜”大会，中午吃忆苦饭等。

劳动课第一是学工，先是在石固机械厂劳动，后来学校有了工厂，有了自己的学工基地，聘请了师傅，生产的“冲床”，远销四川等地。学农主要是下田间劳动，当时搞的有棉花、玉米、高粱等农田试验，均取得良好收成，还到县上参加过展览。农忙季节到生产队帮助社员劳动，还到生产队学开拖拉机、修剪果树等，支援农业生产。王庭湖、雷国海二位老师参与“三河”（石梁河、暖泉河、长胜天湖河）的测量工作约二十几天，王庭湖参与绘制石固公社的行政区规划图约两个月，跑遍了全公社的所有大队小队，还参与测量岗李大队的治岗工作约一个月。全校师生参加治理石梁河的劳动约十几天，男女齐出动，两人一个架子车，赴崆山拉石头支援修河筑坝，拉煤支援公社搞肥料生产，均超额完成了任务。

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根据公社党委的指示，学校组建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陈瑞松老师负责，学生有刘保华、王香梅、王文芳、胡耀平、张爱玲、吴小芹、董凤仙、吴根臣、刘德松、吴明月、郑冠明、马汉杰等，马汉杰担任队长，郑冠明拉弦子。宣传队排演的节目有大型剧《江水英》，短小精悍的节目如《退婚礼》、《草原英雄小姐妹》，还有歌曲演出，宣传了政策，活跃了气氛。

学校还搞军事训练，进行队列表演和比赛，搞行军拉练，开展学军活动。同时积极开展体育活动，搞篮排球比赛、乒乓球比赛，增强学生体质，还开展歌咏比赛，大唱革命歌曲。

学校在公社党委领导，乔庄大队党支部具体负责，全公社人员的大力支援下，又在试验田里盖了十间教室，十几间教师住室，还有茶炉、伙房等，学校又从北院搬到了南院（即现在石固重点中学）。

1973年2月，长葛县教育局让石固高中与长葛一中（今一高）合并，一年后，在石固公社党委和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学校又搬回石固乔庄，除张隆和一人留在一中外，其余全部迁回。

1976年，打倒了“四人帮”，全国上下，一片欢腾。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以后，拨乱反正，各项工作逐步纳入正规，被视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得以平反，他们心情舒畅，积极工作。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

度，学校开始重视学生文化知识的学习，教学开始讲授高中课本，所有课程安排，均按教育部规定的二年制高中教学计划设置，开始增加了外语、历史、地理和生物等课程。还从初中抽调一些优秀教师到高中任教，加强教学力量和对学生的管理。教语文的有董海录、乔海山、曹申全、曹江水。教数学的有郑海泉、马子辰、李民志、杨武州，和新调来的任广太、李志民。教外语的有李根英、朱秀香、王殿营。教物理的有马青山、尹更生。另外，教历史的有岳长建、教政治的有王变侠、教生物的是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校的乔水欣、教体育的马成明、教音乐的李凤菊，还有张致义、谢师良、马会山、王九法、胡荣昌、李金山，校工尹长增、尹汉卿，炊事员胡丙辰、乔明发等陆续到校。

校长也由有 20 多年领导经验的中、小学校长李国栋替代了“临时负责人”李俊生，贫下中农代表也换为纸房李村党支部书记王玉章。学校领导班子还有郑海泉（抓教学）、杨明舟（抓辅导）、郑东英（抓后勤）。下分几个教研组，有语文组、数学组、外语组、政史地组、理化生组。学校比较注重加强教学研究，组织听课，开展观摩教学，教师认真备课，加强辅导，作业全收全改，号召学生住校，增加早自习。根据当时实际，数学、物理、化学复习初中内容一个学期，夯实基础，其余一年半时间授完高中二年的课程。李景周老师还利用星期六晚上，无偿为学生补课两小时，主要是补讲初中文言文，没有教材就用有光纸将课文放大，悬挂在教室，便于学习。学生不分年级，来者欢迎，教室内常常是座无虚席。实践证明，这样做符合当时实际，学生学习成绩逐年上升，对学生参加高考大为有利。

由于公社党委重视，学校领导有方，教师团结协作，学生刻苦努力，石固高中自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一年比一年成绩好，连续几年在长葛县名列前茅。1978 年，高考成绩全县第一，县上奖给电视机一部，当时全县奖两部电视机，初中一部，高中一部，初中一部，被石固镇粟庄初中获得，高中一部，石固高中获得。当晚就把电视放在学校操场供大家观看，以示庆贺。乔庄的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赞：“高中真了不起。”为了奖励高中取得的突出成绩，公社党委书记王金林亲自批拨一批物资以示慰问。

十三年来，石固高中为石固镇培养了许多乡村干部和农业技术人才，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了新鲜血液，为各行各业增添了一批干部和创业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回村当支部书记的有石固二大队的周明水，三大队的王国军、吴明月，四大队的周中民，朝阳村的张子军、张须周、张万章，乔庄村的王殿九，岗李村的梁西林，粟庄村的粟巧荣（女），谷马村的马水凤（女）等。

回村后参加党组织，当村组干部或成为农业治富能手的更是大有人在。升入高一级学校深造的有郭书建（中国矿业大学，现在深圳工作），张福民（河南大学，留校在中文系工作），李昱煜（北方交大，现在省银行工作），唐水申（中山大学，在南昌部队工作），杨建军（河医大，现在省医院工作），周葛天（河大，省地质队工作），马福周（西南交大），王爱香（西南政法大学），王凤英（河医大，留校），王虎山、马志军、杨天才等约60多位同学，大中专毕业后，在不同岗位上工作着。当干部的有王月玲（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纪委书记），张德保（原长葛外贸局局长），宋志立（许昌市粮食局干部），王文芳（许昌市人民法院起诉处处长），马水泉（原长葛教体局副局长），陈建明（长葛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马保周（长葛县人民法院党支部书记），王付旺（长葛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马锦泉（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马位卿（卫生局副局长），还有粟巧荣、刘保华、吴燕子、张和建、乔福山、潘明珠、杨新业等约40多位国家干部，在不同岗位上为人民服务。参军的有马福增、胡耀中、张书义等十几位。从医的有杨有山、周家玺、郑建超、黄宝玲、周宾之（人民医院），李罡灿（新乡医大，现在西安医院工作），乔丙勋、李根昌、侯明华、张松枝（卫校）等约30多位白衣天使，为人民救死扶伤。从教的有王景昌（一高）、李景灿（二高）、马留木、李志军、吴俊义（一中），杨俊臣、李爱云（二中）、杨金周、王中琨、王彩琴（职高）、曹香花、王恒昌（石固）、李改琴（金庄）、尹春福（一小）、杨天才（淑君中学）等30多位教育工作者，为国家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还有办工厂的如杨献伟（瓷厂），杜天军（印染机械厂），王保林（档发厂），乔春生（板厂）等办起了规模较大的工厂，为发展长葛经济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82年秋季，与坡胡高中、后河高中合并，名为“长葛县坡胡高中”。

（作者简介：李景周，长葛市石固镇人，毕业于开封师院中文系。1948年参加工作，1950年任长葛县人民政府教育科副科长。1983年离休。）

“长葛三中精神”亲历记

梅炳喜

长葛三中（按：1954年8月15日，洧川县合并到长葛县，原“洧川县一中”改名为长葛三中。1963年8月31日，原属洧川县的大部分镇、乡划出长葛县，“长葛三中”随之不再存在。）坐落在洧川镇东关，距县城40多华里。它是一所3级18个班的初级中学。它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绩优异，闻名全国。1958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两个好榜样》的社论，并配发了《勤工俭学，边读边耕》——河南省长葛县第三初级中学生产劳动成为必修课的新闻报道。全国各个省市纷纷派出参观团赴三中参观学习，美国的，苏联的教育专家也亲临三中考察。一时间学长葛三中，赶长葛三中的热潮在全国兴起。

1958年10月，我奉调到长葛三中任教师，当时，我年仅23岁。几天后，校长魏光轩从北京归来，晚上他找到我拉家常，免不了一番鼓励和叮咛。教导主任赵金荣同志让我担任九年一贯制实验班班主任，并兼该班语文课。

长葛三中各种实验园地近百亩，担任班主任好似一个生产队长。班里管有1亩蔬菜，1亩主要农作物轮作区、几分苗圃和2亩大田，所以生产工具样样俱全。教室、寝室及我的办公室到处摆的都是农具。学校生物教研组主要指导各班轮作区的种植。轮作区种植按劳动大纲，也就是说学生自入学一年级起，至毕业3年时间里，把当地主要农作物，如小麦、玉米、高粱、大豆、红薯等庄稼的从种到收农作技术全部学习一遍，并达到基本掌握。学校后勤组专门有一名同志负责供应种子、农药并负责保管粮食。作为一个班主任不仅管教课、管学生思想、生活，还要懂得生产技术。开始不适应，只有在干中学，学中干。我先后6年时间里送了两届毕业生，担任了6年班主任。班里设生产委员专门负责农活。该送粪时，我和学生一起用睡觉的铺板抬粪，积肥时与学生一起外出扫树叶，打扫修理厕所抬茅粪，深翻改土，拉耩耕地啥活都干。学生在学校学的技术，回到家里随时可用。有了新品种随时可在家里推广，教育与生产得到了有机地结合。

为了解学生，有的放矢地开展思想工作，我坚持和学生同吃、同

住、同劳动。那时学校设有1个教师食堂，3个学生食堂。轮到开饭时给学生打饭、收票。学生开完饭，自己再吃，在这个大家庭里不存在特殊，师生平等，不分上下。晚上我住在学生宿舍里与家境困难或年纪小的学生同床睡觉。有个学生家住董村，不仅家庭生活困苦，平时只有褥子没有被子，而且年纪小患有尿床症。褥子湿了不敢拿出来晒，怕其他同学讥笑。我从一年级就开始与他同铺直到二年级一年时间，每天晚上唤他起床小便，偶尔尿在床上还要暖湿褥之苦。他一个褥子，我一个被子，可以说是同甘共苦。后来学生及其家长是说啥也不让我与其同床，班里稍长一些学生干部索性轮流搬到他铺边住，把我给挤了出来。几十年过去了，他做为一名中学教师，经常到我处谈家庭，说工作，自然把我视为知己。回忆起少年学生生活时，两人总免不了哈哈大笑一阵，亲热之情，感激之情，钦佩之情一起融入这琅琅的笑声中。

三中出名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相继到校考察工作。特别是中央教育部长何伟、河南省副省长张伯园考察后指出，要变教育与生产劳动上的三脱离为“三结合”。教学要结合实际、结合生产、结合群众。这也便是“长葛三中精神”。

1963年根据需要我改教政治理论课。为教好课程，教师每人都有联系村庄，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与村团干部一起便组织起了村文化技术夜校，文艺宣传队和科学种田小组。养马砦离学校有三四里路，我在教课之余，利用晚上、星期天和假期住在村里风风火火地教文化课、排练文艺节目，搞农业实验。由于深入群众，参加劳动，感性东西多了，教起课来也就倍觉亲切。在我国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政治理论课的重点就是开展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教育。我除在课堂上深入浅出地讲好理论外，带领学生到农村搞调查，丰富学生的感性认识，产生质的飞跃。我集大家的教学体会，先后在县、许昌地区介绍三中政治理论课教学经验：省教育厅长王锡璋在学校蹲点考察后，在三中召开了有全省重点中学校长参加的办学现场会。由我向与会同志举行政治理论课观摩教学，并向大会印发了经验材料。1964年校长魏光轩代表长葛三中赴北京参加全国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座谈会，并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1962年学校又重新组织起了剧团。我作为学校党支部成员负责宣传工作。一批青年教师报名参加。我在剧团内担任主要角色，先后排演了《三月三》、《松树林》、《社长的女儿》、《血泪仇》、《智取威虎山》等一批现代戏，有曲剧，豫剧；偶尔也排演若干出古装传统戏曲。当时，长葛东半县乡

村纷纷到学校邀请剧团去演出。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利用假日还曾经到尉氏、通许、开封、郑州、中牟、新郑、密县等地进行公演。记得我们在密县演出《血泪仇》的一个晚上，有一个农民拉着老母亲坐在剧院一边，边看边流泪每当看到王仁厚一家被逼得家破人亡时，他母子俩看不下去了，抱头痛哭直到剧终。

学校剧团有教师有学生，大家团结友爱、不怕苦累。有一次剧团到古桥魏庄村演出，我们课后集体步行到魏庄时已近黄昏，大家不顾疲劳匆匆地到群众家喝了汤就登台化妆。那天晚上演了两出戏：一出是《血泪仇》，这是配合社教运动干部点的戏；一出是古装戏，名叫《断钱袋》。说的是古代一书生赶考路途中，所带钱被一小人盗去，书生告状、县太爷审案、在堂上巧断官司、将钱袋归还书生。剧中人物有外表糊涂，内心清楚的县太爷，我演这个角色，化妆得像七品芝麻官样子；有掏钱袋的侯七，是个尖嘴猴腮的人；一个青年书生；四个衙役。衙役由四位青年教师扮演，其中一名是个近视眼，经常佩戴一副近视镜，过去老是在上场前才将眼镜摘掉。这次上场慌张，临时一声“喂”，戴着眼镜就走上前台，这时台下观众一阵轰笑，有的指着喊：这是个近视眼衙役！现在见面回忆起往事，不觉一阵好笑。

1965年前我的7年三中生活是紧张、繁忙、充实、愉快，平时老是有一股使不完的劲，没有牢骚，没有节假日，师生之间、同志之间、领导之间，充满了友爱和欢乐。直到今天在每年的学友联谊会上，大家谈起过去的学校生活总是津津有味，充满了留恋之情。

专校岁月

翟发祥

命运真会开玩笑，我在北大书店见到河南出的一本小书《长葛三中在前进》，翻了翻，才知道长葛这个地方，七〇年还真地从北大被发配到长葛“劳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七二年三月竟又被分到几个伙伴嘲笑过的“铁西大学”（因位于长葛——胙山铁路西被戏称）——长葛五七专科学校。

这所学校创建于1972年3月，正式的校名是“长葛县五·七专科学校”，是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即学校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精神而筹建的。学校创建初，主要任务是为地方培训全面技术人才。为了加强师资力量，1973年3月有10余名和我一样“插队锻炼”的大学毕业生到校任课。我便是这“10余名”中的一个。一同进入这个学校的还有我的校友，高我两届的中文系的马云龙，开封师院（今河南大学）数学系的任其亮，复旦数学系的因炮打张春桥被苦整过的张义堂，还有河南农学院的四位，新乡师院毕业的两位。我们的领导周福楼主任见来了这么多生龙活虎、思想开朗的年轻人很是兴奋，今天找这个谈心，明天和那个拉家常，嘘寒问暖，忙得不易乐乎。

这帮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三年大饥荒没被饿死，文革中整过人，也被人整过，在农村或部队农天下过苦力，见过上至伟大领袖毛泽东及中央许多高官，下至各地的头头脑脑，对一切看得比较开，什么都不在乎，胸无城府，口无遮拦，加上当时学校没有女老师，无论什么场合，开会或饭场或晚饭后大桐树下，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什么玩笑都开，什么荤话都讲，信口开河，不知社会凶险。

当时长葛教育局的领导还算有远见。那时各公社有高中，一些大队也开始办高中，师资水平太低。于是教育局让专校趁这年麦假组织全县的高中教师集体备课，说是备课，人集中起来后，大家一致要求专校老师讲。讲语文的一个是大学毕业、教了十几年语文的中年老师，他在给学生讲语法时，在黑板上写“×××（他本人名字）一肚子青菜屎”，让学生分析句子成份而出名；另一个是马云龙，讲课很受欢迎，以致听他课的人渐多，到讲《马

克思墓前演说》一课时，一中的所有老师，教育局的许多领导都来听了，三间教室挤满了人，坐不下，许多人搬个凳子坐教室外听。

到七三年冬天，学校招了个卫生班，农机班。农机班还好，不需去外面聘请老师，自己的物理老师就可以把课承担下来，老师中有一个就是在家搞农机修理的人，修个柴油机、缠个马达不在话下。卫生班招的是赤脚医生，老师是在县医院，县卫校聘请的。卫生班第二年又办过一期就停了。学校逐渐认识到我们是教育系统办的学校，外系统不给经费，培训老师才是我们的主业。从七四年冬以后，学校主要办教师培训班了，先后办过语文班、数学班、理化班、美术班。当时不少大队都办高中了，而许多任课老师自己就没有高中毕业，教师培训是很紧迫的任务。另办过两年文艺班，实际是学戏曲的，由县剧团、县文化馆的老师任课。当时文化教育没分开，仍属一个系统。

年轻人的日子是惬意的，能吃，能睡，能干，能玩。一两饭票一个的包子，一顿总要吃上十个才饱，吃饺子也要吃上一斤才罢休。学校空闲地上种上菜，基本够吃了，二分钱一盘的炒青菜、溜白菜、炒豆角，总要吃上两盘。晚上打起升级来，常常通宵干，干活也一样，在老周的带领下，多少重活累活都不在话下。

七四年夏天，公安部颁布了治安管理的“公安六条”，学校里的那位中年语文老师，或许出于高度的“阶级觉悟”，检举揭发了马云龙。我因离家远，总吃住在学校，已然感到了马云龙的危机，曾提醒过他让他注意。果不其然，到十二月初，省、地、县三级调查组开始行动，调查马云龙了！因为我与马既是同学又“同伙”，故被认为是重点中的重点。找我谈话时，外间和里边套间，两间房里坐满了人，他们多么期待从我嘴里挖出很多个马云龙现行反革命的例证啊！可我让他们失望了，我实在没发现马的哪个细胞是反革命的！

谈话从北大的奇闻逸事，人情世故开始，慢慢切入正题，问：“你和马云龙关系咋样？”答：“很好，我们是同学，他年龄比我大，年级比我高，学问比我深，我一直把他当成老大哥。”那些人一阵坏笑，笑我竟如此坦然，笑我不知洗刷自己。“那你对马云龙这个人怎么看？”答：“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祖国，是个革命群众。”并举了一些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评价。这一下子惹恼了一个人，他气急败坏地用马云龙怎么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言论来反击我，我从这里才多少知道了一点马云龙的“罪状”。我一条条解释，说明是怎么回事，他不听，

一直在训斥我，我也生气了，和他吵了起来，另一些人说我态度不好，我说是他先发脾气的。

晚上又让我去，长葛公安局长也来了，他下午不在。显然是他们商量好，认为我太嚣张，让局长煞煞我的气焰。

调查进行了不到一个月，七五年元月十号终于采取行动了——把马云龙抓了起来。那天我正好去许昌地区医院看望我在董村插队时的房东老太娘。此事被认为是去许昌摸底，事后曾派人去调查。我怎么也想不通，马会是反革命，难道反革命就是这样的吗？

随后的几十天，一直是在揭批马云龙的现行反革命罪行。从几个积极分子嘴里渐渐清楚了马的罪行，开会学习计划生育文件，大家说为啥中国人口增长这么快，而西方人口增长缓慢呢？各人都发表意见，马说西方人夜生活多，唱歌、跳舞、看演出，中国人文艺生活少，晚上没事，早早搂着老婆睡觉，不生孩子弄啥？说罢大家哄堂大笑。这叫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知青捣乱被抓后挨打，叫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说《沙家浜》本意是突出郭建光，让人看了老觉得在突出阿庆嫂，这是剧本的毛病，这叫攻击革命样板戏！说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轶事，是攻击伟大领袖！说张春桥、姚文元的一些事是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七六年，四人帮被粉碎了。到七七年十月后的农闲招生时间，招了语文班、数学班、理化班、英语班，随着国内形势的好转，拨乱反正，重视教育的呼声又高了起来，这年底又恢复了高考，重知识，重人才之风见长，留校当校长的那位工作队副队长经过几个月的接触，观察，发现我们这批年轻人很能干，不是坏人，业务上全靠我们，慢慢开始重视、重用我们这些人了。

七九年元月，也因形势好转，马云龙被放了出来并得到平反。七五年元月至七九年元月，他整整被拘留了四年！

随后几年，随着高考的恢复，县上培训教师抓得很紧，每办一期各科的长期班，大体从十月到第二年五月底，暑假还要办短期班，大家工作都很紧张，但很充实，精神比较愉快。七十年代未到八十年代，长葛的高考成绩一直名列许昌地区前茅与此有很大的关系。从七九年开始，学校办了几届许昌师范长葛班，他们现在都是长葛各级学校的骨干和长葛市不少局委的主要领导。八二年，为了加强高考的力量，我们几人又被调往长葛一高任教，另有几个一起去专校的同事也陆续调离了这个地方。这所学校后来改名为长葛教师进修学校，长葛县“五·七”专科学校从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作者翟发祥：密县人，长葛一高特级教师）

附：

恐怖的等待

马云龙

如果你问我，比“恐怖降临”更恐怖的是什么？那我就告诉你，是“等待恐怖降临”的过程。

对此，我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人们经常把进监狱说成是“下地狱”，可是，在我的体验中，真正的地狱是进监狱前那一个月的日子。

1974年12月2日，是我三十周岁的生日。那天，我最要好的朋友和同事，都是一起经过农场劳动、下乡插队的大学毕业生，如今又在长葛县城一个叫做“五七专科学校”的新建学校里当教师，共七八个人，到我家聚会。买了几斤肉，拎来两瓶酒，个个吃得满嘴流油，喝得面红耳赤。一开始，谈话还有个主题，回忆农村生活，分析政治形势，展望将来的出路，后来，就变成了插科打诨说笑话，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狂呼乱叫。最后，看到夜已深了，才都摇摇晃晃地回家了。这个生日过得热闹而又轻松快活。但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是那段快乐生活的终结日。

过了两天，当我带着欢乐聚会的余兴到学校去上班时，突然发现周围的气氛变得诡异而神秘了。遇到的每个人，不是调头转弯分路而去，就是低头快步匆匆而过，平时最好的朋友见面也只是微微点头，然后把眼神转向别处。这是怎么了？真是见鬼了！

在厕所里遇到了北京大学毕业的校友翟发祥，他左盼右顾之后才和我说了话。“一句话也别说了，什么都别说。”他面目严峻，声音低沉，说完转身离去。

整整一天，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没人来访，没有声音，死一样沉寂。这真是反常，平时我这里总是全校最热闹的地方。外面的校园里也是一片寂静，听不到人声，只有呼啸的北风在屋檐上发出凄厉的鬼叫。

下班的时间到了，我走出校门，在通往县城的土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终于，有一辆自行车从后面赶上来，在我身边停下，是物理教师张凤岐。他匆忙地递给我一张小纸条，然后一句话不说，径直走了。

纸条上写着：“晚八点整在化肥厂后的铁路旁见。”

冬季的晚八点，天已经黑透了。化肥厂后的铁路边没有路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正在摸索着，忽然听到脚步声。有两个用帽子和围巾包裹得看

不清面目的人走近了，一说话才知道，是张凤岐和数学教师任其亮。

他们带来的消息让我震惊：我的三个同事，数学教师张某，语文教师冯某和生物教师陈某，联名写了封举报信，检举了我的大量“反革命言论”。据说，举报信直送一位中央领导手中，现在，一个由省、地、县三级公安、宣传部门的几十个人组成的庞大专案组已经进驻长葛。这几天正在日夜不停地传讯我周围的人，他们俩已经分别被传讯过了。几年后我才知道当时被传讯过的多达几百人。我的同事、朋友、学生和认识的人几乎无一漏网。

传讯中提到哪些问题？这是我所关心的。他们说，到底有多少问题还不知道，但从已经提到的问题来看，问题似乎“上纲上线”，相当严重。例如：

我曾经说过，对毛主席也要“一分为二”，“毛主席也有错误”——这是专案组重点追问的问题之一，上纲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我听了之后回答：“这个问题不要紧，我相信能解释得清。”我记得很清楚，这是在一次政治学习时发生的争论，有人说“一分为二”的理论不能用在毛主席身上，他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什么错误，我不同意，因此发了一通议论。我不认为这就是“攻击”。

还有一条是“恶毒攻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我听后又笑了起来——我们那所新建的学校，上马匆忙，设计草率。由于夹在方向并不垂直的一条公路和一条铁路专用线之间，大门是斜的，进门后的路和院墙形成锐角，十分别扭。一次在地里劳动时，有人提议，为了解闷，大家来玩个“顺口溜联句”，一人一句，必须押韵。我就说了第一句：“专科学校，歪门斜道。”大家哈哈一笑，有人接着续下去：“公鸡学着母鸡叫……”这是真实的故事：学校要搞副业，由生物教师陈某（他是农学院兽医专业毕业）牵头养了一百只鸡。结果死了九十九只，只剩下一只公鸡，还整天学着母鸡下蛋咯哒咯哒地乱叫。有人又续了一句：“任其亮学着女人尿……”这是现场发生的实景：当时任其亮要小便，懒得到几百米外的厕所去，又怕远处的女同志看到，于是就地蹲下来在庄稼中方便了……这个“顺口溜”一直续了十几句，当时逗得大家笑成一团，欢乐无比。这本来就是开玩笑，也成了“反动言论”了？岂不可笑……但是，在我被捕后接到的《起诉书》中，还真有这一条。因为那所学校的名字中有“五七”二字，我说的“歪门斜道”就被解释为对神圣的“五七指示”的直接攻击了。

前两条我并不十分在意，觉得可以解释清楚。但后面说的几条让我心里一沉——“攻击江青同志”。

文化大革命中，我有几次近距离观察江青的机会，感觉总是怪怪的。

一次是1966年8月4日晚，江青和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来到北京大学，在东操场接见全校学生。当时我坐在离主席台不远的地方，第一次见到这位神秘的“第一夫人”。江青在大会上的讲话让我大吃一惊，她突然脱离批判“工作组”的主题，把矛头指向在中文系比我高两个年級的张少华（后来以“绍华”的名字闻名），说张少华和她母亲张文秋都是坏人，她们“霸占”了毛主席有病的二儿子毛岸青。江青边哭边尖叫着说：“我们根本就不承认这个‘儿媳妇’！”这一幕让在场的上万人都惊呆了。我后来曾在一些朋友中间说起过这件事，并说出了自己的感受：这哪像个党的领导人啊，简直像个家庭妇女，把婆媳争端拿到大庭广众中哭诉，真有损她自己和毛主席的形象……

还有一次，1967年9月下旬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国庆游行的预备会，我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座位在主席台上江青后面约两米的地方，所以看得十分清楚。全场的人都到齐了，只等江青的到来。她姗姗来迟，落座后接过李讷（北大历史系学生）递来的书包，从中拿出几个药瓶，在桌子上一字摆开。然后，从每个药瓶中分别倒出一些药片，端起茶杯，在聚光灯下，用很夸张的动作，当着全场几千人的面，一仰头把药吃下……后来，我在和朋友聊天时，多次说起过对这个场景的真实感受：“真不愧是演员出身，好像是在用动作告诉大家：你们看，我是在带病坚持工作啊！”

我没想到，这些在私密场合的谈话竟然都进入了专案组的调查范围。那时，全国正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江青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正红得发紫。“攻击江青”可是个足以杀头的罪名啊，我这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夜黑天寒，又怕被人看见，我们只说了十几分钟，就匆匆散去。这是在我被捕前和同事唯一的一次私下见面。在被捕后的第一次审讯中，这次会面被当成了追问的重点——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在荒凉的旷野和如漆的黑暗中他们是如何实施监视的。

地狱般的日子就此开始了。

明明心里如滚油煎熬，但我还要装出没事一样，早晨起来照常到马路上去跑步，回来照常到院中结冰的水管下去冷水浴，吃了早饭照常去上班，到了办公室虽然没有人来说话，但我还要装作备课的样子……

这期间，还有一次照例举行的“政治学习”，但是气氛和往常迥异。全

校教师都来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发言，所有的人都铁着脸不说话，气氛十分紧张压抑。只有校长兼支部书记周福楼说了一段意味深长话：“在政治学习时，我一直主张大家要畅所欲言，不能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但是，说话也要认真严肃，不能随心所欲，信口胡说……”

这些话，像是在指责什么，又像是在辩解什么。他面目憔悴，两眼浮肿，内心似乎十分痛苦。我注意到，在他说话时，大家都没有表情，只有那三个举报者在活跃地互相交换着眼色。后来才知道，头天晚上，他也被传讯了，当时因为替我辩护，他受到了严厉的斥责。过了不久，他被撤职了，这次讲话也被当成“包庇反革命分子”的证据。

单位的气氛是这样，回到家里，我也不敢说话——因为我当时住在妻子的单位县中学里，宿舍是五开间的大教室分隔改造的，房梁以下用土坯隔开，而房梁以上是通透的，河南人叫“透山墙”。我家西邻是检举人之一陈某一家，而东邻是县公安局的政保股长一家，我像“肉夹馍”一样被夹在中间。那个房子一点也不隔音，邻居家筷子掉在地上都听得清清楚楚，说话就像在一个屋里一样，真的是“隔墙有耳”。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凑近妻子耳边，悄悄地把坏消息告诉了她。她吓坏了，但不敢出声，只是无声地落泪。从此，我们家里没有了声音，有事都用纸写，看完了马上就烧掉。

每天早晨离家时，妻子都要久久地站在窗前，直到看不到我的影子。古人有句诗云“上床与衣履相别”，说的是生命无常，谁知睡下还能不能再起来。我这是把每次离家都当成生离死别，谁知道这一走还能不能回来呢？每天回到家，两人都要长长地出一口气：又熬过了一天！

最难过的是夜里。无眠的长夜似乎长得没有尽头。又不能说话，只得打开灯翻书。但是书上的字在眼睛里跳来跳去，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于是，拿起笔纸来和妻子“笔谈”起来：

“跑吧。”

“往哪里跑？这年头跑到哪里还不是抓回来？再说，监视得这么严，大概出不了县城就抓住了……”

“申诉和解释去。”

“找谁去说？人家没找你，你见了人家怎么说？——人家问你：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消息了？你怎么回答……”

“不知道哪天会抓起来，不知道会关多久……”

经过几夜无声的“长谈”，我对“后事”做了如下安排：

我被捕后，如果长期不能回来了，就请妻子提出离婚——我不能让她和女儿长期生活在“反革命家属”这个可怕的大帽子的阴影下；我自己会尽最大力量为自己辩护，但我也知道，在那时这样做怕是用处不大，如果真的没有希望了，就自我了断。我不能像畜牲一样任人宰割或终生在铁窗下消磨。为此，我还让妻子上街买来两片单面剃须刀，分别藏到皮鞋的后跟里，她垂泪无言地按我的要求办了……

床头的马蹄表嘀哒嘀哒地响着，一个个长夜就这样过去了。

1975年的元旦到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惨淡的新年。妻子默默地包了几十个饺子，煮熟了后，二人相对，无言地吃下。吃完后我跑到屋外，又都吐了。长期的神经紧张和连续的无眠之夜已经超出了身体所能耐受的极限，胃里像火一样刺痛……

我开始不断地祈祷：让该来的早日到来吧！

后来，我在牢房里看到过临终的死刑犯，非常理解他们在听到死亡判决后，为何有人会无望地要求“快一点执行吧！”等待死亡是比死亡本身更可怕的折磨。

这一天终于等来了：1975年1月10日上午，我来到学校后，孤零零地僵坐在办公室中。忽然有人叫门，是范副校长。他回避着我的眼睛，说：“你到会议室来一趟。”

我跟着他走进会议室。一进门，就看到里面有四个穿警服的人。一个面孔黧黑的矮胖子厉声宣布：“我们奉命对你实行刑事拘留。”然后让我在拘留证上签字。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许昌地区公安局的预审科长于某。四年另九天以后，向我宣布释放决定的也是他。

一个高个警察给我戴上手铐，又用绳索捆住双臂。我抬头一看，这人我认识：三年前在农村插队时，村里出现了反革命标语“打倒毛主席，保卫刘少奇”，他曾去破案，还从插队学生中调我去帮助鉴别字迹呢……

被绳索牵着，我走出了会议室。校园里没有一个人，但路过的每个窗户里都有熟悉的面孔在张望。唯一来和我告别的是传达室的老杨头，平时我总好进传达室去和他聊天。当我们一行走过时，他呆立在大门口，轻轻地对我挥了挥手，眼睛里似乎闪动着泪光……

看守所离那所“五七”学校只有三里多路，而我家住的县中在看守所对面，只有几百米远。我被牵着走进看守所大门时，清晰地听到县中的大喇叭响起来：“紧急通知：全体教职员工到会议室集合……”我知道，这个紧急会议肯定和我的事有关。又想到，此刻那边怕是正按照常例在抄家呢……

办完例行的入监手续后，又跨过两道武装警戒的大门，我就进到冰冷的监房里了。

很奇怪，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点也没紧张。铁门关上后，我才觉浑身无力，就席地而卧，几分钟后即进入了梦乡，这是一个月以来第一次如此深沉的睡眠……

（作者马云龙：北大毕业，《大河报》主要创始人，曾任该报副总编辑。本文系作者发表于2012年3月23日《南方周末》的系列文章之第四篇。）

《中国古代书法——楷书》 特种邮票首发始末

朱丽展

2006年11月，国家邮政局公布“2007年特种邮票发行计划”，定于2007年11月5日发行《中国古代书法·楷书》特种邮票一套六枚，分别选自魏晋以及唐代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作品，没有楷书鼻祖长葛钟繇楷书作品。

钟繇（公元151~230年），字元常，东汉颍川长社（今长葛市）人，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繇生于书香门第，矢志勤学，爱好书法，盛暑严寒，练书不辍。宅旁有一池，常洗刷笔砚，致使池水尽黑。繇师刘德升，又博采众长，兼善各体，尤精隶、楷，点划之间，多有异趣，结构朴茂，出乎自然，成为由隶入楷的创始者，后人尊为“楷书鼻祖”，亦称“正书之祖”。钟繇作为中国书法史上有突出成就和深远影响的重要书法家之一，同汉末张芝、东晋王羲之、王献之合称书中“四贤”。其书法呈现出中国书法由隶入楷的新面貌，是晋王羲之真书的先驱。有《力命表》、《宣示表》、《荐季直表》等代表作品。其名作《宣示表》，无款，共18行，最早见于《淳化阁帖》，后翻刻较多，但传世以宋贾似道单刻帖为最佳。此帖为奏表，即所谓“章程书”。用笔刚柔并济，提按并用，笔短意长，点画异趣横生，虽尚存隶书中燕尾似的“磔”笔，但楷书的钩、挑、撇、捺等笔法已随时可见，而且相当熟练，结体上下密而左右疏，取横势，自然古雅，有翩然之态。章法采用竖成行而横无列的开工，字大小随意，行间非常分明，通篇和谐灵动，境界超妙，正如南朝梁武帝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所评：“钟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十分形象。

长葛认为发行楷书邮票没有楷书鼻祖钟繇的作品实在是一件憾事。为使钟繇楷书作品列入楷书邮票发行计划，许昌市邮政局于2006年12月29日特邀国家级邮展评审员戈中博，许昌三国文化研究会主席史友仁及相关人员参加钟繇楷书作品申请列入《中国古代书法·楷书》特种邮票发行计划可行性研讨会。会上，专家学者谈钟繇楷书的历史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大家一致认为，长葛市委、市政府应将钟繇书法作品申请入选《中国古代书法

·楷书》特种邮票发行计划列为重要工作，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宣传地方文化，打造文化品牌的极好平台。许昌市政府通过省文联副主席齐飞、省集邮公司艺术总监刘钊二人联系到中国书协主席张海，张海主席表示，中国书协可以向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致函。许昌市政府副市长秦春梅、副秘书长秦国生、长葛市委书记赵正风、宣传部长李凤英前往郑州向河南省政府史济春副省长汇报邮票发行事宜，史济春同意向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致函。借中国邮政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冯新生到郑之际，秦春梅副市长一行又专门向冯新生副总经理汇报此事。许昌市委毛万春书记向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总经理刘安东致信，并在随后召开的全国人代会上亲自向刘安东总经理建议将钟繇楷书作品入选《中国古代书法·楷书》特种邮票。长葛市委宣传部李凤英部长，市政府孙保群副市长专门进京向中国文联胡振民书记汇报，由中国文联向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致函。7月18日，钟繇作品《宣示表》正式列入《中国古代书法·楷书》特种邮票发行计划，并被选为一图。

钟繇作品成功入选《中国古代书法·楷书》特种邮票发行计划，是长葛人民乃至许昌的一件喜事。9月5日，钟繇作品入选《中国古代书法·楷书》特种邮票新闻媒体见面会在长葛人民政府召开，《大河报》驻许昌记者站、《许昌日报》、《许昌晨报》、许昌人民广播电台、许昌电视台、长葛人民广播电台、长葛电视台等参加，《中国古代书法·楷书》特种邮票首发式活动第一次以新闻媒体的方式对外广泛宣传。9月13日，长葛市教体局组织全市中小学生开展书信征文活动和书画大赛，号召大家学习钟繇刻苦学习精神。

2007年11月5日，《中国古代书法·楷书》特种邮票首发式在长葛市体育场隆重召开。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中央、中华集邮联合会副会长盛名环、河南省邮政公司经理杨海福、中国著名邮票设计家王虎鸣、河南省文联副主席范军、中华钟氏总会常务副会长钟志垓、中华钟氏总会川渝分会会长钟梁、河南省书协副主席胡秋萍、许昌市委书记毛万春、许昌市委副秘书长艾祥涛等人参加了首发式活动。中华集邮联合会副会长盛名环、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中央、许昌市市长李亚、河南省邮政管理局局长杨汉振共同为邮票揭幕。中共长葛市委书记赵正风致辞，河南省邮政公司杨海福经理、河南省文联秘书长、书协副主席张剑锋分别作了讲话。此枚邮票的设计者王虎鸣亲临现场签售，河南省著名笑星范军等嘉宾也到现场助兴。

为配合首发式活动，省书法家协会与长葛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钟繇杯”当代著名书法家楷书作品展、河南省精品邮集展，数百枚中外珍贵邮

票在现场展出，其中世界第一枚邮票《黑便士》，《红印花》等珍稀珍品亮相。当天下午，中华钟氏宗亲总会的代表还到钟繇陵园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

《中国古代书法·楷书》特种邮票首发式活动的圆满成功，对于弘扬中国的书法艺术，强力打造长葛的钟繇文化品牌，奠定长葛作为“钟繇文化之乡”的历史地位，进一步提升长葛的城市文化品位，加强海外钟氏文化交流，扩大和提升长葛的对外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作者朱丽展：长葛市邮政局电子政务局局长)

第九編

兵事 匪患

李自成农民军长葛之战

袁耀坤

明末崇祯年间，陕西米脂县出了一位著名的农民军起义领袖。他英勇善战，处事果断，是个具有雄才大略不平凡的人物。他率领数十万农民军，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几经危难，终成劲旅，为当时起义军的主力军。最后攻陷北京，颠覆明朝，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闯王李自成。

李自成当过驿卒，还当过守边的士兵，后来加入高迎祥的农民起义军。由于他有勇有谋，作战勇敢，深得高迎祥的格外器重，成了一名“闯将”。高迎祥牺牲后，被义军推为闯王。

崇祯七年（1634年），朝廷为了消灭农民军，特设陕、晋、豫、湖、蜀五省总督，采取四面合围、各个击破的战术，妄图尽快将义军剿灭。崇祯八年（1635年），各路义军被围困在河南一带。为了击溃官军的包围，十三家共七十二营的首领，于正月间在荥阳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策。在会议上，各家义军领袖在作战问题上意见分歧，久议不决。当时李自成已是七十二营中一营的首领，他在会上激励大家：一个人有决心也能战斗到底，何况还有千万人马呢？官军能把我们怎么样？最后他提出“分兵定向，互相策应”的突围作战方案。经各家首领赞同后，就联合分工，四面突围，打得明军五省总督洪承畴，首尾难顾，十分狼狈。

根据会议分工，高迎祥、张献忠和李自成从荥阳向豫东南和安徽一带突击。

正月二十七日，高迎祥等所部大军抵达长葛境内。因是义军首次来葛，群众对义军不甚了解，所以有些慌乱，躲躲藏藏，不敢接近。当时长葛知县李在公，将城门紧闭，驱众守城。义军为了摆脱官军追击，进军神速，无意攻城，所以就不攻而去。大军东去之后，直抵凤阳，焚毁皇陵，再北折破颍州，围商丘，继而西上入陕西。又据1930年《长葛县志》记载，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农民军又攻长葛，知县李在公命令兵丁出战。第二天，义军再度攻城，知县亲自督战，同典史倪拱辰、举人孟良屏及生员张范孔等用大炮击死义军数十人。李在公又指令他的家丁李守和内兵贾世威等率领乡勇，同义军鏖战于双洎河上，从上午10点直到下午3点，搏斗甚为激烈。义军殉难60

余人，并损失一些马匹器械，最后义军撤出战斗，县城未被攻下。

崇祯十三年（1640年）正月，李自成攻陷洛阳，杀了福王朱常洵。接着大军东移，围攻开封，攻了七天七夜，没把开封城攻破。撤军时，途经洧川、长葛，由于他们急于对付左良玉和从陕西来袭的汪乔年，疾速而过，没有攻城之举。在襄城擒杀汪乔年之后，左良玉退往湖广，接着又在新蔡、项城之间击杀了傅宗龙，军威大振，在中原大地上几乎没有可以与之对抗的官军了。李自成在豫西山区把部队整训之后，于当年的十二月初，偕同罗汝才、袁时中等统帅50万大军二次围攻开封。十二月初八日，前锋部队到达长葛，围攻县城。知县高山斗与李自成是同乡，欲作内应，将城献出。这一计划被教谕欧阳植发觉，坚决反对，就伙同孟良屏等人，激励士卒，登城严守，致使高山斗献城计划未获实现。第二天，攻破禹州的义军续来增援，在城东北隅，缘绳攀木，肉搏登城，把守城兵丁击溃。义军进城之后，欧阳植等人还督率一些士绅与义军对抗，最后全部被义军捉拿，计有130余人。时隔一天，义军将这批顽固抗拒的士绅押送到驻扎在城东南隅李家庄的军营中。义军统领先责问高知县：“你为什么不趁早打开城门，让大军进城？”高山斗指着那一群乡绅说：“一切由他们当家，我作不了主呀！”当义军统领诘责欧阳植等人时，他们不仅不低头认罪，还痛骂“反贼”，当即被义军推出营外斩首。最后又派部分义军进城捕杀了一些官绅民众。

十二月中旬，义军陆续到达开封城外，李自成大营驻扎在开封城东宋门外，罗汝才驻扎于城南繁塔寺。义军经多次猛攻，仅将开封东北城墙轰塌一段，由于明将陈永福等竭力防守，城未攻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义军撤离开封。

李自成撤离开封之后，大军由北而南，由南而北，连陷西华、陈州、归德、商丘、睢州、太康、宁陵等几十个州县，把开封外围各县的官军、乡勇全部肃清，开封成了被农民军包围的一座孤城。这时，李自成认为攻取开封的时机已经成熟，就于三月间兵临开封城下，采取长期围困，使其弹尽粮绝不攻自破的策略，将开封团团围住。当时，崇祯皇帝诏起孙传庭为总督，命侯恂为督师由河北南下驰援开封，并召左良玉由豫南挥师北上向开封进逼。左良玉率部抵达朱仙镇后，见李自成兵多将广，声势浩大，心生恐惧，在一日夜间率部逃逸，自成尾追不舍，良玉军大溃，人马损失无算。正当左良玉溃奔襄阳途经葛之际，李自成尾追至长葛石象一带，这样就发生了李自成与左良玉的长葛之战。

这次战争发生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三月左良玉在朱仙镇溃败之后。

当左良玉败退时，李自成在左军退路前挖了深、宽各为一丈五的壕沟，其长有百里之遥，自成亲率大军阻其退路，左军大乱，人马仆沟相互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左良玉如惊弓之鸟，带领溃兵沿尉氏、洧川向长葛一带逃窜。李自成乘胜衔尾跟进至长葛石象附近，迫使左良玉不得不组织残兵败将“连营五里”，仓惶应战。溃奔百余里而疲惫不堪的乌合之众，哪里还有招架还手之力，被李自成杀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一窝蜂似的星夜南逃，退守襄阳。至此以后，左良玉再也没有窥视中原之举了。现在石象乡的左场和五里营一带，就是当时李自成与左良玉双方交战的地方。大战之后，人们就把这一带的两个村庄改为“左场”和“五里营”了。

（作者袁耀坤：见《长葛地名综述》注）

农民军火烧封升寨

袁耀坤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水旱为患，税苛赋重，民不聊生。广大农民为了活命，不得不揭竿而起，反抗朝廷。这样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战争。

火烧封升寨，是李自成农民军与地方上的顽固封建势力进行的一场战斗。这场战斗，既不象攻陷洛阳震动朝野，也不比三围开封兴师动众，所以正史未载，而却在县境内的村里街巷之间流传至今。

在石象乡西部，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土岗。其岗不长，北高而陡，南低稍平，人称封升岗。据1930年《长葛县志》记载：“上有古闻人墓，碑犹存，但不知姓名年代”。依此推断“封升”之名，似乎与古闻人有关，但由于年久碑圯，无据可考，很难道出其中原委。在岗北端最高处，有土寨一座，凭险而筑，四周陡峭壁立，是个易守难攻的土堡，因寨建于封升岗之巅，所以寨就以岗为名了。

当李自成率领农民军进入河南之后，世居岗寨附近的一些财主富绅，就麇集寨内，据险顽抗。每逢义军过境，因寨处偏僻地区，无碍大军行动，所以不被农民军所注目。及至李自成二次围攻开封，决心扫清中原地区之际，凡有反抗农民军的城寨，绝不允许它象钉子一样继续存在下去，坚定不移地要一个一个把它拔掉。

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二月上旬，围攻开封的农民军前锋部队抵达长葛，即将县城攻破，而封升寨却凭险固守，安然无恙。为了绥靖地方，安定民心，并为大军东去解除后顾之忧，李自成就决定派一支部队去攻取这个寨堡。

在李自成看来，攻打一个土围子并不需要多少人马。他将一个姓陆的将领叫到跟前，把攻寨任务交给了陆将军去完成。陆将军接受任务后，就率领所部驻扎在尹家堂附近的一些村庄上。接着就察看地形并研究攻寨方案。经过商讨，认为寨踞悬崖峭壁的高岗之上，比洛阳、开封的城墙高得多，用梯子攀登困难很大；用大炮轰击，即使把寨墙轰塌一段，人马也不易靠近；用挖洞填药的放进法，岗高且厚，也是徒劳无功。经过几天试探性的进攻，义

军只能在岗下声张叫骂，而寨上却毫无动静。当时有人提出采用火攻，可从哪里弄到很多柴草呢？因一时想不到攻开寨子的良策，李自成就把陆将军所部的义军留下，准备长期围困，看看寨内到底有多大力量，能坚持多长时间。

当李自成统帅大军第二次撤离开封兵临长葛时，封升寨仍在义军四面包围之中。为了拔掉这个钉子，李自成同他的军师们多次商议，决定采用火攻的办法，以便早日结束战斗。办法虽然定下来了，而他也为如何征集柴草，如何近寨纵火有些为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就微服简从走出大营到岗下去察看。当他途经一个菜园时，抬头看见一个被梅豆秧爬满的菜园庵，干枯的梅豆秧迎着冷风瑟瑟作响。他驻足片刻，似有所悟，随即打消外出察看的念头，返回大营。回大营后，李自成就命令陆将军派人到各处收集梅豆种子，并对陆将军说：“等到清明节以后，你把梅豆种子绑到箭头上，射向岗坡、寨墙和寨内，越多越好。梅豆发芽出土后，经过夏、秋两季，梅豆秧就会厚厚地拖满岗崖和寨墙，寨内的树上，房上也会缠绕攀缘着很多梅豆秧。到霜降以后，梅豆秧枯萎，即用火箭射向岗壁、寨墙以至寨内，到时岗、寨一片火海，任凭岗险寨固，还有攻不破的道理吗？”

陆将军遵命而行，把收集到的梅豆种子全部用箭射向岗寨。守寨的乡绅不知是计，听任梅豆秧到处攀附。入冬以后，义军认为攻寨的时机已到，趁着一天有风的黑夜，火箭齐发，射向岗寨，刹那间，火光四起，烟焰冲天，整个岗上成了火的世界，寨外岗土烧焦，寨内房树成灰。困守寨内的顽劣土绅，由于火势凶猛，一个也没逃脱，全部葬身于浓烟烈火之中。

火烧封升寨之后，已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季，陆将军奉命跟随闯王进军襄阳，把明将左良玉驱赶到远离中原的长江沿岸。

义军走后，人们把陆将军扎营的村子改名陆营。营坊村名来源之一，也与农民军驻扎有关。据封升岗附近的群众反映，以往在岗上特别是下过大雨之后，不断发现烧焦的麦子和杂粮。在平岗造田时，还曾有刀剑一类的兵器被挖出。这些情况，足可作为农民军火烧封升寨的佐证。

（作者袁耀坤：见《长葛地名综述》注）